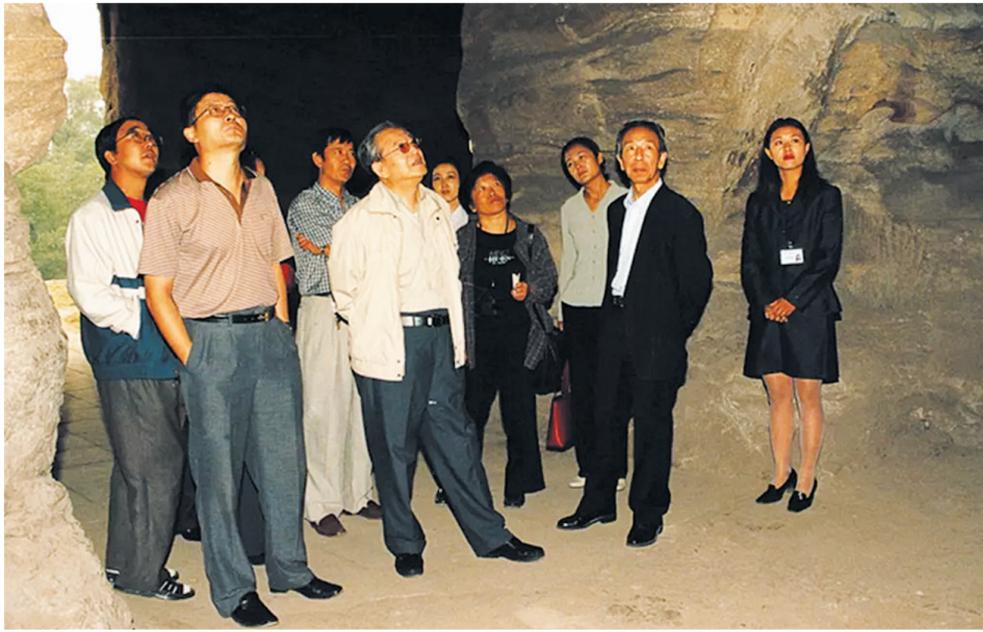




《魏书·释老志》中的一段文献(上)

——兼论云冈模式

杭侃



2000年8月宿白先生考察云冈石窟

编者按

8月3日,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诞辰102周年。先生一生关心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事业,多次带领学生考察云冈石窟,直到晚年依然牵挂云冈的学术事业,是云冈学的实际奠基人,为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宿白先生根据云冈石窟的分期和艺术源流,首次提出“云冈模式”这一概念。即日起,《大同日报·走进云冈》分上、下两集刊发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最近撰写的《魏书·释老志》中的一段文献——兼论云冈模式一文,谨以纪念。

《魏书·释老志》中有一段论及龙门石窟开凿的文献,殊为珍贵: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书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这段文献包含着很多信息,现就此段文献拟三个议题,试加解读,以就正于方家。

一、宦官与石窟工程

这段文献中提到的白整、王质和刘腾都是孝文帝、宣武帝时期的风云人物,三人在《魏书·阉宦传》中均有传。其中白整、王质的职务都是大长

秋卿。北京图书馆藏《魏代中常侍大长秋卿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云阳男张君墓志铭》记录了白整的生平: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刘陵县东路乡吉迁里人。源出荆南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宦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策官掖,幼有明肃之称,显祖异焉。高祖嘉其祗笃,授以太官令,除中给事中,迁中常侍立忠将军、云阳男。上美其勋绩,加大长秋卿刘骥驎将军,委以六官之事。春秋六十,景明四年十月廿一日寝疾薨于第。皇上悼悼,朝闻悲恸。使持节策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男如故。十一月廿五日葬于洛阳之西北斗泉陵。”

白整深得孝文帝信任,“委以六官之事”。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元宏崩,遭诏赐死皇后冯润。北海王元详奉命前往冯润宫里将其赐死,但冯润不肯服毒,与元详同去的白整强行灌其毒药,冯润死时年仅三十岁,追谥为幽皇后。事见《魏书·皇后列传》:

“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遣诏。北海王元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

可见白整在孝文朝参与政事之深。

王质继白整之后任大长秋卿,但时间不长,据《魏书·阉宦传》:

“王质,字绍奴,高阳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蚕室,颇解书学。为中曹吏、内典监。稍迁秘书中散,加中书舍人,赐爵永昌子,领监御。迁为侍御给事,又领选部、监御二曹事,复特加前将军,进爵魏昌侯。转选部尚书,加员

外散骑常侍。出为镇远将军、瀛州刺史。质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恶,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答戮,号为威酷。高祖颇念其忠勤宿旧,每行留大故,冯司徒亡,废冯后,陆叟、穆泰等事,皆赐质以玺书,手笔莫不委至,同之戚贵。质皆宝掌以为荣。入为大长秋卿,未几而卒。”

刘腾更是曾经权倾朝野。刘腾在这段文献中的职务是中尹,但他也做过大长秋卿: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处。寺北有滹沱池,夏则有水,冬则竭矣。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诵不常。奇伎异服,冠於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踏,常有死人。”

宣武帝即位之初就下诏为他的父亲孝文帝和亲生母亲文昭皇后营建两座石窟,白整是实施这一皇家工程的具体领导者,其后的王质和倡议为宣武帝再建一座石窟的刘腾都是宦官,也就是说与云冈石窟第一期五位皇帝开凿的五座大像窟不同,曇曜五窟工程的领导者曇曜是来自凉州的高僧,而龙门石窟的皇家工程领导人已经变成了宦官。这一变化并不始于龙门石窟,在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的开凿过程中,负责皇家工程的领导者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与曇曜的失势和冯太后实力的崛起相关。

曇曜圆寂的时间不详,《续高僧

传·曇曜传》没有记录他去世的时间,但在《魏书·释老志》中延兴二年(472)孝文帝发布的诏书中还可以见到“沙门统曇曜”的名字: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资州镇维那文移,在合者资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挥,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住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曇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观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

值得注意的是,继任曇曜沙门都统之职的是方山思远寺的寺主僧显。

唐道宣著《广弘明集》(664年)卷二十四收录的《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记:

“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淄素攸同。顷因暍统独济,遂度兹任。今欲昆德兼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膺副翼。”

这是孝文帝任命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为新的沙门都统,任皇舅寺法师僧义为都维那的诏书。据《魏书》记载,方山思远寺的修建时间与太和元年(477)与太和三年(479)两说,因此僧显出任思远寺主的时间可以推测为在477年或者479年以后。

思远寺在太和三年(479)八月之前已修建于方山(《魏书·高祖纪》),建后不久的太和五年(481),开始营建冯太后寿陵和永固石窟,并于太和八年(484)竣工(《魏书·冯太后传》)。思远寺寺主僧显显然是冯太后信任的僧人。这从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也可以得到印证:《水经注·瀑水》记如浑水“又南迤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采上之,炜炜有精光”,可知皇舅寺是冯太后之兄冯熙所建的寺院,内有华丽的五重塔。

这是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曇曜集团的失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会影响到了武州山石窟寺的开凿。《魏书》所记载的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的记录,在太和七年(483)五月以后断绝,自此至迁都洛阳的大约10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皇帝行幸的记录。与此相对照,479年“幸方山,起思远佛寺”以后,480年八月、481年四月、482年三月、483年七月、484年四月和七月幸“方山石窟寺”、485年四月和六月、486年六月和七月、487年五月、488年四月和七月、489年四月、490年

正月和七月以及同年九月冯太后驾崩、十月葬于永固陵,都有孝文帝巡幸方山的记录。所以,石松日奈子认为“此后武州山石窟寺不再是平城佛教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新任沙门都统僧显的方山思远寺。这意味着因为曇曜的下台,武州山石窟寺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太和七年之后,云冈石窟的开凿与皇室之间的关系是否疏远可以再议。云冈石窟分为三期,云冈石窟在第二期,即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多开凿成组的双窟,议者多认为这与为孝文帝和冯太后“二圣”祈福有关。据宿白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洞窟就有由宦官主持兴造的,也就是说皇家石窟的营建工程主要负责人,在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已经由高僧转变为宦官。如云冈石窟的第9、10窟,宿白先生根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推测为钳耳庆时(王遇)所主持开凿。《金碑》记崇教(福)的情况是:“今寺中遗物所存者有二……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岩昌钳耳庆时铸开寺。其铭曰:承借口福,遮避冥灾,仰钟皇家,卜世惟永。盖当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又云:“崇福则成于钳耳。”《金碑》征引遗物标明“其略曰”“末云”,表明《金碑》有关钳耳庆时在云冈营造的有关内容,是节录碑文,而不是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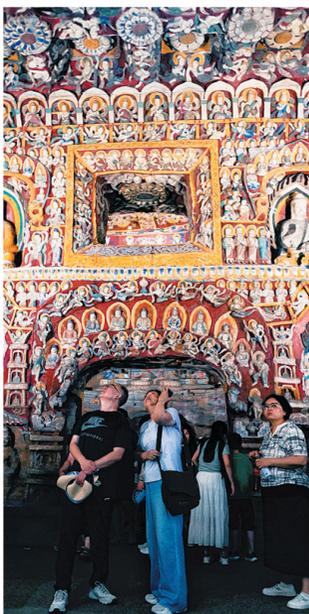
《魏书·阉宦传》有王遇传,称“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父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贵,追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

本传记其“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墓”都是王遇所作。迁都洛阳之后,宣武初,王遇兼将作大匠,“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

钳耳庆时信佛教,《水经注》卷一三《瀑水》记他在平城东郊建祇园:“(平城)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岩昌公钳耳庆时立祇园舍于东泉,椽瓦梁栋,台壁根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园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架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



云冈石窟景区内昙曜塑像



“云冈石窟”亮相郑州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石窟文化是黄河文化及古代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云冈石窟作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融汇东西方文化、中华多民族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的文化艺术宝库。8月5日,“丝绸之路·黄河:长河灵岩”主题展览在郑州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大同市委宣传部指导,郑州市文物局、云冈研究院主办,郑州博物馆承办,展览展出云冈石窟相关展品55件(组),包括云冈石窟代表性文物展品、3D打印展品、相关研究历史档案等,带观众走近云冈石窟,深切感受其恢弘壮丽的风貌和蕴藏其中的丰富文化内涵。

据了解,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全面介绍云冈石窟的考古发现、石窟概况及保护历程,展出云冈石窟窟前与山顶遗址考古发现的建筑材料、生活用具及石雕塑像,同时将云冈石窟保护维修的档案资料公开展示,重点介绍了云冈石窟二十年来的数字化保护发展历程,诸多展陈内容均为首次亮相。

为了让观众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云冈石窟风采,此次展览还将1:1比例高精度复制的云冈石窟第12窟,“搬”到了郑州博物馆一楼大厅,重现气势恢宏的洞窟、形态各异的雕塑与绚丽多姿的壁画,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以及承载千年石窟艺术的视觉盛宴。开幕当天,郑州博物馆内,游

人如织,观众们纷纷表示,走进3D打印的第12窟,仿佛自己置身于云冈石窟内,满壁的伎乐天正随着旋律跃跃欲试,久坐不动的佛、菩萨都被这美妙的佛国音乐、舞蹈所陶醉。观众们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是由北魏皇室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所兴建,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技艺精湛,代表了公元5世纪中国雕刻艺术的顶尖水平。

本次展览的推出,对于加强晋豫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弘扬黄河文化和丝路精神,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云冈云平台”助推云冈学发展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通过研发云冈云平台,借助数字技术助推云冈学发展,努力实现云冈石窟“保存在大同、研究在世界”的目的。云冈云平台建设都包含哪些内容?该平台研发后,为云冈学研究带来了哪些便利?日前,记者深入云冈研究院采访一线科研工作者获取答案。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李丽红说,云冈云平台是2023年10月份(试运行)上线的,是以云冈文献数据、文物信息及学科知识为一体的数字化知识体系平台。这个平台包括二维的老照片,还有三维的数据模型、档案资料以及遗产监测资料,为云冈学的建设提供了数据的支撑。云冈云平台通过给科研人员授权账号的形式,让科研人员在异地可以实现对数据的浏览、查询、研究,最终要实现云冈

石窟保存在大同,但是研究在全球的目的。

数字化在科研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通过数字化过程,无形之中把不可再生的资源保存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文物电子档案。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科研办主任郭静娜说,数字化所产生的文物扫描影像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非常便利,石窟寺科研工作者一般需要在洞窟爬上爬下,但是有了云冈云平台,便可以在电脑上随意浏览或者提取每一尊造像的资料,甚至可以把洞窟内高处的造像拉到很近的距离进行查看,很多细节一目了然,便于研究。

云冈研究院将不断加快云冈学体系建设、发展、完善工作,借助云冈云平台研发助推云冈学研究迈上新台阶。

(赵小霞)